



2020

鹏飞九天 文种花地

花地文学榜

揭晓

2020花地文学榜年度作家(作品):



年度作家
麦家

《人生海海》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年度长篇小说
邓一光

《人,或所有的士兵》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9年7月



年度短篇小说
叶兆言

《吴菲和吴芳姨妈》
《青年作家》
2019年7期



年度诗歌
于坚

《于坚诗集》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年5月



年度散文
李修文

《致江东父老》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年9月



年度文学评论
孙绍振

《文学文本解读学》
黄山书社
2019年10月



年度新锐文学
蔡东

《星辰书》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4月

1964年出生于浙江富阳。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曾获第七届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奖。2014年《解密》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2015年获美国CALA最佳图书奖,2017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列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间谍小说”。

1956年出生于重庆。出版长篇小说《我是太阳》《我是我的神》等10部,中短篇小说《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狼行成双》等百余篇,曾获得首届鲁迅文学奖、冯牧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林斤澜短篇小说杰出作家奖等。

1957年出生,南京人。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1986年获得硕士学位。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花煞》《别人的爱情》,散文集《流浪之夜》《旧影秦淮》等。

1954年出生,四川资阳人。70年代初开始写作,出版有著作50多种,包括《于坚集》《于坚文集》《于坚诗选》等。曾获鲁迅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吕梁文学奖等。现为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1975年出生,湖北荆门人。著有长篇小说《滴泪痣》《捆绑上天堂》及散文集《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等,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新人奖等。现任湖北省作协主席。

祖籍福建长乐,1936年出生于上海。196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文学创作论》《新的美学原则在东方崛起》《月迷津渡:古典诗歌个案微观分析》等。散文集有《面对陌生人》《灵魂的喜剧》等。现为福建师大文学院教授。

1980年出生于山东。主要写小说和艺术随笔,曾获得十月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等。出版专著《深圳文化:生长与展望》,小说集《星辰书》《我想要的一天》等。现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兼任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指导单位:深圳市委宣传部 羊城晚报报业集团
主办单位:羊城晚报社 深圳市福田区宣传部
支持单位:广州阿里巴巴文学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年度盛典

时间:11月26日 15:00-17:30
地点:深圳·福田 五洲宾馆B座华夏厅

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
Special Funds to Promote Publicity, Cultural and Sports Development of Futian District
本项目由福田区宣传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拒绝流行】曹林 北京时事评论员

我写的不是“文案”

上期专栏谈到了对“小编”这个词的反感,在自媒体内容生产的语境中,另一个谋杀了新闻专业价值的表述是“文案”这个词。我写的不是文案,而是文字、文章。一篇新媒体文章后,常常看到这样的署名:文案/某某某。“小编”常常传来一段文字:老师,你来看看这段文案如何?我来配一段文案,写一段适合传播的文案,这个文案不错……什么文案?本来是商业体系的一个概念,公司或企业中从事文字工作的职位,文字不是主体,而是用来表现策划者已经制定的创意策略,是一个与广告创意先后相继呈现的表现过程、发展过程与深化过程,存在于广告公司、企业、商业传播与新闻策划工作中。“文案”在自媒体自媒体交流话语的泛化,

文字工作者沦为“文案”,见证着商业权力对文字写作的凌驾。文案这个词意味着,文字并没有主体性,只是体现商业创意的附庸。当然,广告、宣传、公关、营销工作中,文案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但当文案泛化时,文字都用文案所代称,没有作者,没有了创作,都成了体现别人某种创意的文案,专业价值就被谋杀了。在媒体转型语境中,我还反感另一个表述,就是“一张图让你了解什么”。这深深体现着严肃文字的焦虑和退场,好像转化成“一张图”才成了获得读者青睐的传播正当性,在这种图像拜物教中,专业主体性也被消解。并不是每件事都适合图像去表达,也不是每一件事都适合“一张图”表达,这种简化自身去迎合他人观感的表达,带来了专业主体的退隐,也弱化了思考。

【含英咀华】黄维樑 香港学者、作家

人文学者应有之义

《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理论具恒久性、普遍性、实用性。在建设“新文科”之际,我们应有“新龙学”。新龙学的一个重点,是把此书的“心花”开出来,长成果实。我们推崇此书,研究其三万多字,写了数千言的论著;如果只爱而不用,只阅读其理论而不用实际批评,我想孔子也会惋惜了:“诵《诗》三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我绝非“一根筋”的人文学术实用主义者。我们需要对理论著作作严谨的学术性讨论以至争辩,需要对经典的源流版本作详尽细致的考证;我还认为,即使是沙龙式、重研讨过程获得共识的学术活动,也有其价值——或有锻炼智能的好处,或有以文会友的联谊情趣,或有“无用之用”的意外效果,或有表彰一地一国之“软实力”的作用。然而,我认为人文理论的研究应有实用的一面。工程师等科技专家为国家

的“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建设作出了实在而辉煌的贡献,还有航“天”等科技工程的贡献。最近,又有上海“进博会”那座四瓣巨厦,又有福建那飞驰高铁的跨海长桥!而人文学的理论研究者可持续的学术活动,也有其价值——或有锻炼智能的好处,或有以文会友的联谊情趣,或有“无用之用”的意外效果,或有表彰一地一国之“软实力”的作用。然而,我认为人文理论的研究应有实用的一面。工程师等科技专家为国家

【如是我闻】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星座问题

多年前,历史学者雷颐写过一篇题为《星座问题》的文章——

在上世纪30年代恐怖无比的“大清洗”时期,有一天晚上,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别墅的花园中夜宴闲谈时,为天上一个星座的名称小有争论。莫洛托夫说是猎户星座,卡冈诺维奇说是仙后星座。由于二人争执不下,在一旁笑吟吟的斯大林认为此事容易,给天文馆打个电话就可搞清楚,便吩咐秘书给天文馆打个电话。谁知原天文馆长、一位天文学家已与其他几位著名的天文学家一起被“清洗”,而新任的天文馆长并非天文学家,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对斯大林秘书的电话,这位新任馆长当然不敢怠慢,急忙派出去一位尚未被“清洗”的天文学家。这位天文学家自许多同行好友被捕后一直惶惶不可终日,此时见一辆汽车半夜突停在自家门口,门铃又按得很急,以为末日已到,在开门时突发心脏病死在门口。汽车只得疾驶去找另一位天文学家,而

这位天文学家与新近被“清洗”的那些天文学家亦是好友,也因此而惴惴不安。他住在楼上,在夜里两点半突然被急促的门铃声惊醒,见一辆小汽车停在楼下,也以为自己的大限已到,这位年已六十的老人不愿再受凌辱,便纵身从窗口跃向夜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几经周折后,天文馆长终于在清晨5点打听清楚了星座的名称,急忙给斯大林别墅挂电话:“请转告……”但值班人员回答说:“没人可以转告,他早就睡觉去了。”这是一个让人感到悲哀的故事。2008年我参加过一次有关苏联汉学家波兹德涅耶娃的座谈会,她整个人生不断遭批判、被怀疑,但依然坚持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让人肃然起敬。她的父亲波兹涅耶夫(1865-1937年)曾为学养深厚的东方学家,在被派往中国期间被捕,1937年的大清洗中被捕,并很快被枪决。波兹涅耶夫家破人亡,学者、科学家要对自己研究的领域负责,而不是政治,他们需要一定的弹性空间,才能从事好自己的研究。

【昙花的话】尤今 新加坡作家

把月亮摘下来

今年的儿童节,身系圆圈的丹尼尔决定送一份特殊的礼物给他四岁的女儿。在监狱的安排下,丹尼尔透过了视讯,给他坐在家里的小宝贝讲故事:“从前,有个小女孩,对她亲爱的爸爸说,她想要和天上那个圆大灿灿的月亮玩耍;她爸爸毫不犹豫地说:宝贝,没有问题。你等着吧,我去给你摘。第二天,他背着一把沉甸甸的梯子,攀上了无数的崇山峻岭,最后,历经艰辛登上了最靠近月亮的那座险峰。他放下了梯子,一步一步地踏着梯阶慢慢向上攀登,终于,成功地摘下了那个高高在上的月亮,千里迢迢地带回家去,送给他亲爱的女儿。”丹尼尔在屏幕那端动情地讲述着,他女儿在屏幕那一端

动心地聆听,当听到爸爸终于把月亮送到女儿手上时,她开心地笑了。丹尼尔四年前因为贩毒入狱时,女儿才两个月大。他懊悔莫及地说道:“我在女儿的成长岁月里缺席了,但是,我不能让感情也缺席。为她讲故事,是沟通父女感情最佳的途径。对一个囚犯而言,改过自新而重返生活的轨道,犹如摘月亮一样的困难,但是,我希望通过这个故事告诉她,为了她,再困难的事,我都会去做。”丹尼尔身在监狱里,然而,他却让温暖的故事长出翅膀,飞到女儿的心上。过去,父母亲为我们娓娓讲述故事的情景,是童年永远的温馨和快乐。可叹的是,现代许多父母,心门只对手机开放。孩子想要听故事吗?梦里去寻。

● 随手拍

山水之间

每次来到从化都有惊喜,无论是厚重的人文历史还是淳朴的乡土人情,感觉总有聊不完的话题,看不尽的美景。夏日傍晚,晚饭过后,天还是亮堂堂,来到小镇上的林荫小路散步。峰回路转,落日余晖。忽然间,宁静的溪流河水映入眼帘,河水波澜不惊,澄明如镜;加上蓝天映照,对岸星火点点,山峦起伏,树木参差,水上真实与水中倒影融为一体,让人迷恋于这梦幻般的山水之间……



本栏目投稿邮箱:ycwbwyb@163.com

【横眉冷对】杨小彦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阿伦特的三个契机

我总在想,是什么原因让阿伦特洞察到了平庸之恶?可能有一个契机让她得以完成这一使命。第一个契机是她18岁时遇到了哲学家海德格尔,这成了她终生的情感陷阱,即使清楚眼前的思想家是一个纳粹党人。她为此挣扎了一辈子,哪怕思想上有了清晰的结论,却还是拗不过身体本能的反应。再也没有比肉身更短暂的存在了,这是平庸之恶无成本之载体。

第二个契机是在逃亡的路上认识了本雅明。两人命运与共,匆忙地行走在危险日益逼近的路上,每日每时具体而微地探测着恐惧的深度,并勇敢地承担起救助者的使命。后来,本雅明多次过境不成,送在一个漆黑之夜自我了结。战后,阿伦特收集本雅明生前的文章整理结集出版,好让这个本来肯定要消失在历史中的敏感者重新被世人所认识。阿伦特说,身后之名不是平庸者的命运。第三个契机是她亲眼目睹了杀人犯艾希曼在以色列法庭上胆

怯甚至不懦弱日常表情。似乎没有理由把眼前这个人和凶残的刽子手联系在一起。而艾希曼的辩护词只有一句:执行命令!命令肯定是邪恶的,但执行命令是否也属于邪恶?这是对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的无情追问。阿伦特明白,在这里,平庸之恶得以上升为公开的与大范围的暴行。所以,我不认为阿伦特的洞察仅仅是一种学术。相反,如果没有这样三个人的契机,哪怕你读书破了万卷,也无法抵达真理的彼岸。

【不知不觉】钟红明 上海《收获》杂志副主编

“燃灯者”的情怀

2018年,作家袁敏在《收获》推出知青专栏“兴隆公社”,其中有一篇《乡村教师》,写的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北大荒农村孩子们奉献青春的一群知青教师。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话题,其中勾起的不仅是昔日草茅棚里的乡村教师的怀念,还有对教育这个凝聚全社会目光的话题的延伸思考。于是,2020年,袁敏在《收获》开设了“燃灯者”的专栏。袁敏在开篇第一篇《书生休休》,讲述创立了“宏志班”退休后又到贵州山区建立学校的陈立群校长。此后,她每一次的撰写,都伴随大量的第一手采访。作为教育现场的“潜伏者”,一个个生动的教育案例与理念,被作家推

送到读者面前,其中最本质的,还是教育的“人文情怀”。希望孩子就读于名校,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可能是中外家长的共同之处,但只有给孩子自己寻找真正兴趣的空间,他才会找到源自自身的动力,而不是被动的学习。但这样的教育者所要面对的,可能是庞大的社会、学校与家长、心理、固有体制……险阻重重。最新一期的“燃灯者”,袁敏的标题是《母羊的心》,写的是到遥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创建学校的“月光”,她一次次亲自考察选址监工,建图书馆,发动朋友们助学,给愿意送孩子上学的家庭补助,追踪那些孩子的成长。那是一颗颗滚烫的如同母亲的心,但却给了无数孩子改变未来的实质性的机遇。